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成吉思汗帝国史

〔德〕巴克霍森(Joachim Barkhausen)著 林孟工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成吉思汗帝国史

〔德〕巴克霍森（Jochim barkhausen）著 林孟工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吉思汗帝国史/(德) 巴克霍森著; 林孟工译.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69-9

I. ①成… II. ①巴… ②林… III. ①成吉思汗(1162~
1227) — 人物研究 ②蒙古族 — 民族历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
K827=47 ②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953号

成吉思汗帝国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69-9/K.336

定 价: 94.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理解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德〕巴克霍森（Joachim Barkhasen）著 林孟工 譯

成吉思汗帝國史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原序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窮源溯始，原是歐洲內的事件。它却一變而爲世界大戰，則因爲整個世界的運命是操在歐洲手裏，及世界的形勢是由歐洲決定的。大戰以來，還不及二十年，而世界的政治面目已經改變了。在今日，倡言世界運命是繫於太平洋之說，幾乎是說明一種普通的思想。歐洲的新戰爭很可以不牽動世界其餘各地，而歐洲呢，雖然坐在四圍鞏固的營壘裏，却難於不過問太平洋的戰爭。因爲，在今日，歐洲的運命是繫於東半球事變的進展，而歐洲將從東半球的事變裏決定它的永久形勢。

不管如何，我們開始習慣於這個新的狀態，而并不像舊時代的國人那麼天真的相信世界的中心是與市場的中心相符合。可是，如若我們想到過去歷史的重心絕不是永久的在歐洲，或許我們對於眼前經過的事實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將加緊武裝以應付未來的威脅。直至十五世紀末年爲止，在政治上，歐洲似乎是處於無所偏袒的旁觀者的地位，恰如它在地理上所處的地位一樣：面積有限而傍於亞細亞大地的一個半島。白種民族之開始得到勝利的前進，乃在層出不窮的發明當中，在這時代，他們幾乎降服了整個世界。然而，即在這個時代中——到於今不過相隔了二百五十年，有一批亞細亞的軍隊竟然威嚇

了維也納的門戶。歐洲霸權的時代——前後不過五百年，似乎達到它的末期，我們已經看到盛極必衰的起初幾種徵兆了。

中世紀歐洲的大事，我們知道很清楚——往往也不甚高明；然而，在同時代，亞洲是過着一段範圍極廣大的世界政治的世紀，我們在這方面所知道的是極其有限。本書敘述蒙古帝國的歷史，預備大多數的讀者都能閱讀，它應當不僅限於擴大歷史的敘述，同時也應作為未來的鑑測。我們應當注意到亞細亞洲內沉睡着的政治力量。成吉思汗所資以建立其國家的思想，現在是還未消滅的。反之，民族思想的狂潮是洶湧澎湃於整個亞細亞，從博斯福魯（Bosphore）以至黃海，人們正在從新播種過去昌盛時代的傳統觀念。少年土耳其將其國會喚作「庫魯兒台」Kourultai。當年成吉思汗即以這個名稱給與他的帝國大會議；在西亞細亞的土耳其人民中，滋長了驅逐以色列外族及在法律上以「蒼狼教」代替舊國教的運動，而這個「蒼狼」也就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始母。

在最近幾年中，曾有若干敘述成吉思汗傳記的著作，為首的應推哈羅、蘭伯（Harold Lamb）的傑作。這些作品，大概都採取了小說的體裁，僅僅注意蒙古帝國創造者的身世。將地面各國之最奇特和最廣大的國家的全部歷史寫出來，我們覺得是更有需要的，而這個國家的宗教，經濟，軍事的面目，都在這部歷史裏據實表露出來。

蒙古史的材料來源，主要方面是分屬於中國，亞拉伯，亞美尼亞的紀年史，如非專門學者便不易閱讀。但有一批研究家，經過多方努力後，曾審查過這方面繁雜的材料，并將之集中起來。第一部應推何威士（Henry H. Howorth）之分訂四冊的「蒙古史」，次為法國人多桑（D' Ohson）及略恩（Cohnu）的著作。我們也曾利用愛爾特曼（Erdmann），漢默，浦格斯塔（Hammer-Purgstall），格魯塞（Grousset）的研究——他們曾繙譯了蒙古王子撒難薛禪（Sanang Setsen）的紀年史，我們也利用了優爾 Yule 及其他著作家之關於馬可孛羅遊記的研究。

約阿喜謨、巴克霍森序

法文譯本序

短促而眩耀不可一世的蒙古戰功史，實爲普通大衆所未知悉。即使有談到的，而蒙古戰功的樞紐，却因其羅列了自相矛盾的細事和次要的事蹟，而淹沒於瑣屑的傳聞中了。本書的特色即在於從紛紛亂絲堆裏揭露了其中的線索。一般所持的證據都不免有着另一種缺點，即它們都僅根據了軍事史的形態，即是說，僅囿於蒙古史的外形。本書則着重於它的內在生活和它的精神上的來歷：以與鄉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對立而言，這乃是游牧生活之最後的昌盛時代，這個游牧生活，在沉淪於今日半死滅的狀態之前，曾達到它的最赫赫炎炎的形態；特別可異的，這個游牧主義，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以色列教，還是處於珊蠻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亞東部及亞洲極北部之一種極其淺陋的幻術教）的地位，而無論在何處，它每遇到了它們，都一一壓伏了他們。這些事實所以不曾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許是爲着蒙古騎士的活動中心是較近中國而不近歐洲，雖然他們也曾飲馬於亞德里亞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個時候，中國的進化是遠在歐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歐洲進步，且爲文化的高峯；所以，如不做效中國，即要將中國打倒——在我們看去，凡是中國的文化，應視爲獨立發展的一個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動力的限制，即

是說，與歐洲文化相形之下，它是先天流產的。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蹟外，蒙古史又是一個種族事蹟史——不論是有心的或無心的，這個論斷便使我們非開發和確定那裏面所包含的意義不可了。本書著者在談到蒙古政治集合體——它是隨各種時代而變遷的——的時候，總是說：蒙古種族。我們在譯文裏，每次遇到這個字眼用得適當的時候，即是說，在大部份的場合中，總要保存這個字眼，理由是如下：我們西方人是屬於歐羅巴種（彼此都屬於大歐羅巴種或白種）；蒙古的民族則構成了大蒙古種或黃種的核心。在這兩種之間，則有着突厥種族，我們不如把它叫做「韃靼突厥種」(Tartar)，使之不至與土耳其的奧士緬理突厥種(Turk osmanli)相混，後者僅占着一小部份。那些韃靼突厥人曾好幾次列入蒙古政治集團裏面，或甚至居於領導份子的地位。可是，韃靼突厥種或中央亞細亞西部的土耳其種(Touranien)，在種族上，到底何所歸屬呢？在這個問題上，人種學家的見解各相懸殊；多數人是把他們列入蒙古種裏，其餘的則認他們為歐羅巴種。我們則以為韃靼突厥人的全體是構成了一個地方的集合體，而非種族的集合體，其中有若干單位（例如謙河 *Kenisai* 河源的索伊奧特 *Soiete* 民族），確是真正的蒙古種，其它的單位（例如突厥斯坦的乞兒吉思 *King-its* 民族），是介於蒙古種與歐羅巴種之間，最後其餘的單位（例如奧士緬理民族），則屬於歐羅巴種。但是，像韃靼突厥族的語言與蒙古的語言，雖然相隔很遠，却有着親屬關係；像在那些歷史事變裏，這兩個

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構成了一個民族；像在肉體上，比較帶蒙古種成分的韃靼突厥人是多於歐羅巴種的韃靼突厥人，且占據了較廣大的地面；末了一點，當我們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又須無論在這個界限之那一方面用一個字眼加諸這個民族身上，因此，我們就很有理由的說，在人種上講，韃靼突厥人就使不是蒙古人，至少總屬於蒙古種。可是，對於蒙古人主張，或對於有人替蒙古人主張，將凡多少類似他們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種的字眼，這實有着更精確的一點，可以解釋其中理由。也像金粟色的北歐人為歐羅巴種典型之最特殊化的術語，也像北歐人每遇有表現他們性格的地方都認為他們勢力之表現一樣，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國人的民族——雖然在程度上沒有這麼劇烈，也實為從烏拉山延至麥哲倫羣島之廣大人羣的人種典型，即一般所謂最純淨的但實際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為我們人種學者所喚作大蒙古種的。換句話說，蒙古人在大蒙古種裏所扮演的脚色，恰是與金粟色種人在大歐羅巴種裏所扮演的脚色一樣，而範圍廣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體之具有一個人種的事實，總而言之，乃是我們基於上述解釋，在談到蒙古人身上的時候，而可一般的引用人種這個定義的理由。

可是，這蒙古人與蒙古種的名詞的產生，就如本書所闡述的，是依賴於創造這個蒙古功業的人物本身，即是說，依賴於成吉思汗身上。因為，為蒙古民族的歷史曲線的來源，同時又為其最高峯者，乃是這個人